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毁灭的种子

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美] 易劳逸 著 王建朗 王贤知 贾维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毁灭的种子

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美] 易劳逸 著 王建朗 王贤知 贾维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毁灭的种子/(美)易劳逸著;王建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1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059-4

I. 毁… II. ①易…②王… III. 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
IV. 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2114号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Copyright © 1984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SPPH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5-235

书 名 毁灭的种子

著 者 (美)易劳逸

译 者 王建朗

责任编辑 王翔宇

装帧设计 武迪 姜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8.625 插页4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059-4

定 价 21.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译者的话

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后,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

在中国,对于大陆学者来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对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够,当然也就对这段历史时期中所包含的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所以,至今我们也没有产生出一部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分析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的著作。同样,对于台湾学者来说,由于国民党人对自己的失败抱着无穷的懊恼、后悔和对共产党人的仇视,所以就竭力掩饰自己的失败。他们或是避而不谈、避重就轻,或是寻找借口、诿罪他人。因此,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一本比较客观且认真地探讨国民党失败原因的著作。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关于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曾经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不管是官僚政客,学者文人,都为此争论不休。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的评价,众说纷纭的解释充塞于报章杂志、大学讲台和政治集会之中。其中,既有许多学术研究的真知灼见,也不乏危言耸听的

政治偏见。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三种看法:第一,以美国政府在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为代表。它一方面竭力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说明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援助不力,而是因为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和人心丧尽。此外,也是苏联政府的阴谋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怂恿。第二,一些文人政客声称,国民党的失败是美国政府的罪过。他们说,从罗斯福、杜鲁门到马歇尔和艾奇逊,不是坚持反共防线,而是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第三,大多数学者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自身的腐败、反动以及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他们以充分的材料,对国民党政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到了7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这种观点逐渐为多数人所赞同,并且出版了不少内容丰富、值得一读的著作。

《毁灭的种子》就是这类著作中的一本,也是分析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最新成果。该书的作者易劳逸先生是美国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一位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专家,也是一位治学严谨、富有成果的学者。易劳逸先生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在《毁灭的种子》之前,他还发表了另外两本著作:《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和《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显而易见,这两本书和《毁灭的种子》是一脉相承的姐妹篇,它们比较系统、客观地回答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对于国民党失败原因的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在史实和理论上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缺陷。因此,当李宗一老师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时,我们感到,如果能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不仅会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推动的作用,而且还能使关心这一问题的广大读者从中有所收益。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进展顺利。

李宗一老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本书的作者易劳逸教授也给予了热忱的帮助。在1987年10月初于南京召开的《民国档案和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们见到了易劳逸教授,同他谈了我们的想法。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回国后不久,就给我们寄来了中文本的序言。此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同志也为我们的译稿付出了很多心血。借此机会,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1988.4

本书初次翻译出版时,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意见,大部分注释未译。此次再版,将全部注释及参考书目译出,以备读者检索。译者并对译文重新作了校正。本书序言、第一、八章由王贤知校译、第四、五章由贾维校译,其余章节及参考书目由王建朗校译。

原著中,大部分注释未标明征引书名,只标明作者及所引书目页码。译者依原著格式译出,读者如需进一步查考出处,敬请参阅书后所附参考书目。

此次再版,承蒙府建明先生耐心督导,在此深表感谢。

译者

2008.10

中译本序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革命胜利，对美国政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早在1947年，冷战的飓风已经把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吹得寒气逼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又大大增强了那儿的反共逆流。1950年2月9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四个月，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我手上，掌握着一份为国务卿所熟悉的205人的名单，他们是共产党分子，然而却至今还操纵和支配着国务院的政策。”不久，参议员麦卡锡虽然将他名单上的“叛国者”裁减到只剩81人，但是，他讲辞的主旨依旧如故：在美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结果，美国不能给予有力的援助以防止蒋介石政权的垮台。

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历史上，对这些人的无休止审查——他们“将中国丢给了共产党”，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国务院内，最富有经验和学识的中国问题专家，诸如谢伟思、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由于他们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积弱，预感到（而不是鼓励）共产党的胜利，而被麦卡锡和他的反共伙伴们诬为共党同情分子，断送了前程。在各个大学，一流的汉学家，像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也受到了类似的诽谤。结果，

即使在学术论文和大学讲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对共产党中国的赞赏，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共压制达十几年之久。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反共淫威的收敛，人们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胜利，是因为它有坚强的组织和正确的军事战略，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失掉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支持。不久，学者们对共产党革命运动历史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解放区和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的基础，尽管这还不太详细。

但是，当我在着手写《毁灭的种子》这本书时，还很少有学者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和探讨蒋介石失败的原因。那时，我们对国统区的了解主要是依据一些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国务院的报告以及对国民党进行揭露的书籍（像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虚假的”，甚至是“共产党的宣传”。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写《毁灭的种子》一书的过程中，我力图用确凿而无可辩驳的材料来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材料是国民党自己的出版物。通过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调查局档案馆的广泛合作，我得以阅读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报告，如兵役部公布的报告以及国防部对反共战争的正式讲评。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这本书。它主要依据国民党自己的文件，说明了194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显然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不久，雷利·桑德兰（他是一部重要的关于战时在华美军历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对本书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我想，这也是我在写《毁灭的种子》过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写道：“我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得以开拓。它使我们联想到佛利兹·费希尔《寻求世界霸权》一书的出版(德国,杜塞尔多夫,1961年版)。在费赖堡档案馆,费希尔接触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来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学者们大量依据的外交文书只能有限地用日记和回忆录来补正,而这些东西自身也值得怀疑,甚至解释不清。1961年,事实取代了臆测。因此,有关德国战争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费希尔起步的。同样,你的工作也是一个开端。谨致祝贺!”

我希望中文本的读者们也会发现这本书是精彩的和有价值的。

易劳逸

原序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数日之前，虽然蒋介石在上海血腥镇压了共产党人，但新政府还是在群情鼎沸之中接管了权力。国民党的统治似乎预示了一个平安、繁荣和民族自强的新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被军阀混战耗尽民力，为外国列强鱼肉凌辱之际。

然而，革命者不约而同地发现，治理国家要比夺取政权更艰难。孙中山的革命计划，民主、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提出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并没有能够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经济的衰退，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起义，削弱了国民党改革派的决心，耗费了新政权的物力。国民党统治的头四年，到处是地方实力派的反抗，他们有时单干，有时联合。结果，在1937年7月日本进攻之前，国民党政府大约只有六年安定的时间来推行其复兴计划。

不过，在这十年的最后一二年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吉祥之兆。经济稳步上升，各省似乎和中央政府取得了协调一致，民众也基本上对政府抱着新的乐观态度和良好愿望。特别是1936年9月两广事件的和平解

决,以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三个月返回南京,更大大提高了国民党政府的声望。因此,在当时的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国民党政权大概是能够实现其初衷的。^①

正是这些假象掩盖了蕴藏着的积弱和动荡。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

毋庸讳言,这个政权是和社会脱节的。社会中的集团和个人,譬如一些资本家、地主、学生或爱国团体,偶尔也能够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压力。但是,并不存在常规的沟通渠道,可以对政府产生作用。这种状况,就像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的:“各种集团都可以各显神通,表现出它的独到之处和能力。商人行贿,学生骚动,工人罢工,流民抗议;还有军队政变。”^②国民党政权难以摆脱这些外界的影响,同样,这些影响也很少对他有所触动。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爱国热情所激起的广大民众,暂时忘却了这个政权所固有的弱点。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华北全线崩溃,但蒋介石还是全国公认的领袖。1938年10月以前,蒋介石的司令部设在武汉,于是民众就把高昂的士气和热情誉之为“武汉精神”,以激励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不到十年,世界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军队缺乏战斗力,知识阶层,包括学生、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早已对这个政权不抱幻想。农民、城市工人,甚至商业

① 人们通常用“政权”这一术语来指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就像他们所说的“苏联政权”或“卡斯特罗政权”,而说不说“美国政权”或“英国政权”。我引用这一术语出于不同原因,即表现国民党政治状态中不可预测的力量可能在国民党、前国民政府以及军队三个中的任何地方。此处并无任何轻蔑的用意。

② 亨廷顿,《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第196页。

阶层(如一向对共产党百般恐惧的资本家)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强大。到1948年中,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这支军队具备着无与伦比的坚强战斗力。他们富有革命的热忱,而这恰恰是国民党所缺乏的。因此,上帝的旨意,如果有的话,迅速而决定性地倾向于共产党人。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放弃总统职位,心灰意冷地引退到老家浙江溪口,最后来到台湾。八个月后,和平之神降临北京城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37年至1949年的政治巨变呢?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巨大负担,把国民党政权推向了失败的边缘?是像国民党人长期以来争辩的那样,因为美国政府在內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国民政府,中止了对国民党的绝对支持和物质援助?还是因为1937年以前就业已暴露的种种弊病,使这个政权在40年代同共产党斗争时,变得更加脆弱?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采取了类似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不仅仅限于对表面特性的描述,也不奢望一览无遗。地质学家的方法是,在众多的断层中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这样,就能具备丰富的材料,对整个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假设性意见,避免陷于就事论事。

在我的研究中,主要材料来自1937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许多典型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具体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许多隐藏于政治现象之下的力量,从而,对历史的动力——它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必然趋向及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作出恰当的评价。

当然,这个方法的成功,主要依靠对选择的事例所作的深入分析。在这本著作中,选择事例的标准是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典型性要求事例充分反映国民党统治的各个方面。这样,再对其做仔细的研究,就能勾画出国民党统治的总的特点和过程。可研究性要求包含这些事例的材料是丰富的,能产生出有意义的真知灼见(有几次,在我研究一些事例时,由于所需的材料未能具备,所以只能放弃这种努力)。因为,如果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工作带有选择性的话,那形成的看法将会是片面而经不

起推敲的。因此,我认为事例的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将有助于我们对两个方面都能有所了解,即国民党政权和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进程,也有利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们推进他们对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的学习。

本书的第一章所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战时建立于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同以龙云为首的昆明地方政权的关系。早在1966年,谢里登(James E. Sheridan)就用“军阀主义余孽”来说明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尽管表面上统一了全国,而实际上由割据军阀控制的地方政权仍然顽固存在。^①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军阀主义余孽依然深深地潜伏在这个政权的躯体之内。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的许多嫡系部队在战争初期就遭到了覆灭,因此,国民党政权内的政治离心力加大了。照地方军阀看来,中央政府的力量已经相对削弱。这种变化的政治后果是不同寻常的。从此以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地位和声望不断遭到挑战。抗战期间,云南势力同中央政府屡次发生公开的矛盾冲突,仇视和猜忌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年代里,这也许加速了国民党在同共产党斗争中的失败。

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们不能统一,是国民党政权机制的致命弊病。但是,这种分裂状况的病因是什么呢?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采取其他的措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正是我们在下面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现代“农民革命”的典型例子。现有的关于这场革命所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农民以及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但是,对国统区的农民则完全忽略了。在本书的第二、三章内,希望通过对国民党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忽略。抗战期间,国民党主要从农民那儿获得人力、财力和粮食的供给以支持战争。因此,农民的安乐是受国民党政策和行为影响的。例如,

^① 谢里登,1966年发表的《中国军阀:冯玉祥一生》,第14--16页。